

日本历史讲座

第八卷

(日本史学史)

〔日〕历史学研究会 編
日本史研究会
北京編譯社譯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日本历史讲座

第八卷

(日本史学史)

〔日〕历史学研究会 編
日本史研究会

北京編譯社譯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館

1964年·北京

歷史學研究會編
日本史研究會
日本歷史講座 第八卷
東京大學出版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二刷

內部讀物

日本历史讲座
第八卷
(日本史学史)
〔日〕历史学研究会 日本史研究会編
北京編譯社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街口装订厂装订

统一书号：11017·218

1964年9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73千字

印张7 8/16 印数1—5,000册

定价(9) 1.10元

出版說明

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会和日本史研究会所編《日本历史讲座》，共有八卷。前五卷于1956年出版，后三卷1957年出版。

这是一部由分工編写的一系列专题集合而成的日本通史。每卷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专题，各时期的重要問題大都涉及。每卷前面的序論，都由知名的进步的历史学家执笔。从各卷里不少章的内容，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是企图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日本历史的。

战后日本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漲，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大发展。战前的研究集中在奴隶制时代和明治維新的历史，战后扩大到日本历史的各个时期。战前对于中国史书上記載的“倭五王”研究还不够充分，战后則能利用日本考古新的发现和中國文献記載相互印证。战前不能充分揭露日本軍国主义和軍部的統治，战后关于近現代史的論著大为增多。战前对于某些問題的看法还不免于片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庄园大都由奴隶耕种，庄园兴起之后全国土地便尽入庄园；战后由于《平安遺文》这样丰富完善的資料集的出现，根据大量材料研究的結果，多数学者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如此等等，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些战后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成果，在本书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我們可以从这部书里得到日本进步的史学家笔下描繪的日本历史的概貌。

日本人民在日本共产党的領導之下，正在不屈不撓地进行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因此，我們就希望了解日本人民的真实历史。本书的翻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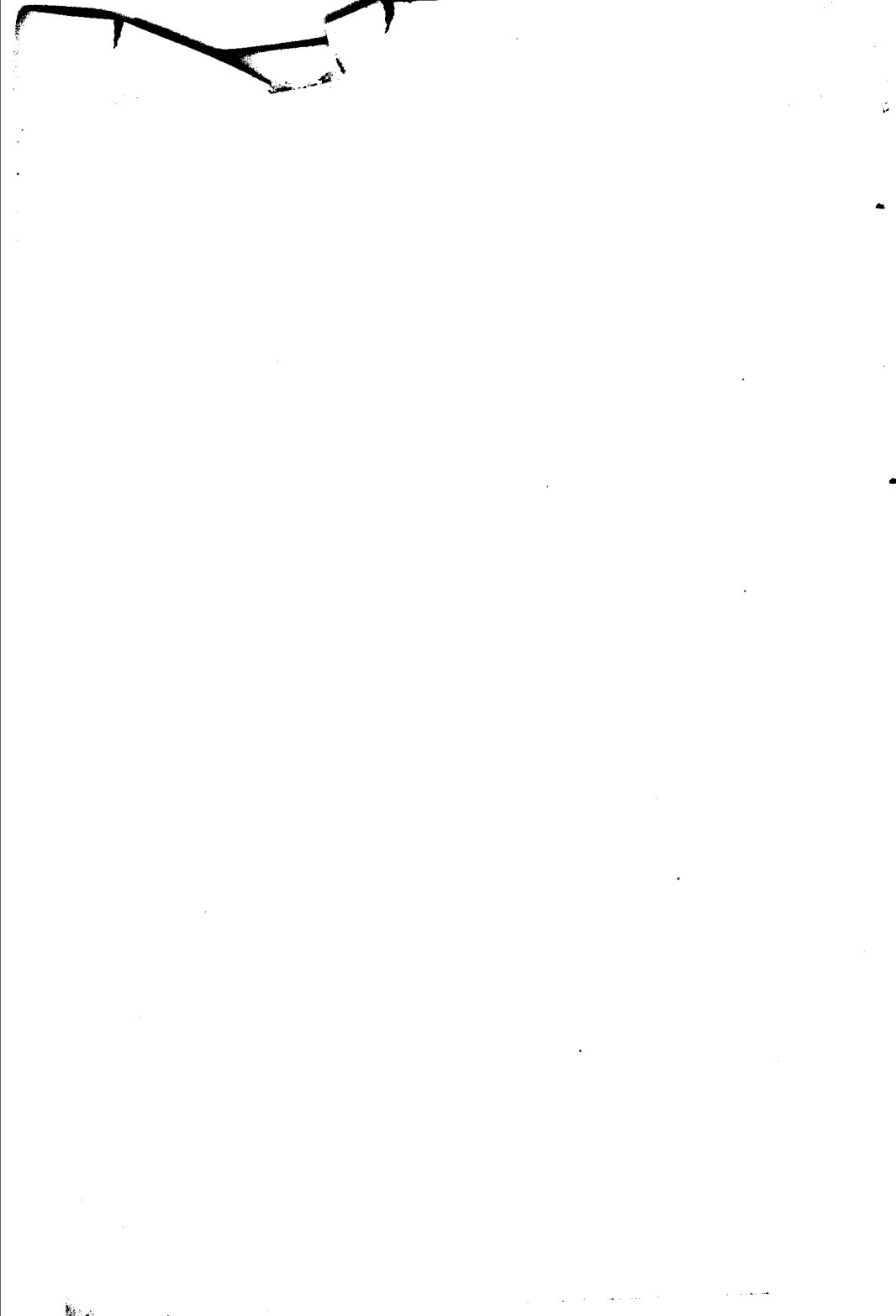
版，正是为了満足我国研究日本历史的讀者的需要。中譯本将按原书八卷出版。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4年1月

目 录

序 論	3
古 代	
一 記紀与鏡	17
中 世	
二 愚管抄与神皇正統記	27
近 世	
三 罗山史学	60
四 新井白石	83
近 代	
五 启蒙史学	108
六 官学学院派的成立	119
七 社会經濟史学的成立	137
八 文化史学	161
九 津田史学的本质及其遺留的課題	178
十 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成立	208
附录 参考书目	232



序 論

石母田正

I

在日本历史讲座中加入“史学史”部分还是創举，所以首先就这一点略加說明。关于历史的概括叙述，一般采取对以往的研究成果簡單概括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本讲座也不例外。但事实上，这种概括只是表明历史学的历史的一个阶段和断面。在这里，通常把这种概括背后的学术进步的漫长过程省略了。本讲座之所以要編輯一本“史学史”，就是为我們史学研究者本身探討及讀者考虑这門历史学的历史，提供綫索。但是，“史学史”究应包括哪些内容和采用什么形式，还没有成規可循。在日本，也仅仅有过一些尝试，在西方，虽然也曾有人写过叫做史学史或历史叙述史一类的著作，可是，能否作为我們編写史学史的楷模，还是很大的疑問。因为这究竟还是历史学中的一个新的部門，有待于今后的創造。为此，还需要作种种尝试。

对于史学史，恐怕需要把它和学說史或研究史分別开来考虑。学說史和研究史，例如日本庄园史或明治維新史的研究史，以及关于这类历史中的个别特殊問題的学說史，是闡明就某种特定的对象和課題，究竟以往曾經从什么观点提出問題，已經解决了多少，还有哪些問題沒有解决等等。它的特点必須是密切結合着对象，具有問題史的性质。这种研究史和学說史，可以成为想在今后研究某种特定問題和特定时代的人們的指南，能够起到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的作用，所以它主要是为了滿足研究者的需要。史学

史，虽然不能和这种学說史或研究史截然分开，而且必須包括学說史或研究史，但是，这两者还是不同的。学說史要求紧密結合对象的問題史式的叙述，而且叙述得愈細致、愈具体就愈好，所以有必要就历史学的各个部門或各个分科一一編写学說史。这不但需要每个时代的經濟史、政治史以及法制史、文学史、思想史等，而且需要古文书学、文献学等部門的研究史。当我们考虑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时，固然不能离开这样名目繁多的分門別类的学說史，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能构成史学史。这一点是和学术的性质，特别是和典型地表现在历史学上的特性分不开的。

一般說来，在学說史里，最关心的是研究的历史，即关于某一問題都有什么人曾經怎样讲过，并且怎么进行了論证，至于每个学者的立場、世界观、方法和体系等，通常并不成为主要的問題。但是，任何学說都不可能和学者本身的立場、世界观、方法无关。这一点，不管学者本身是否意識到，或者象所謂实证主义历史学那样故意抹煞这种关系，它始終是一个不可动搖的客观存在。即使是一个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家，实际上也总是和特定的世界观或意識形态結合在一起。由于这种意識形态历史地受到时代、阶级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制約，所以，学說史或研究史也因此而成为整个意識形态的历史的一环，同时和社会或政治的历史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得到发展。科学可以一步一步地、而且无止境地接近客观真理，但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每个科学家的思維，却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就产生了科学的阶级性等等，科学的进步，事实上，就是在互相对立的思想意識以及学說間不断的对立、斗争和矛盾中实现的。在学术和学者之間的矛盾和对立的情况下，学术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流派、集团和宗派等（其未充分近代化的，則

以“學閥”的形式出現)，就在這些的對立中，學術向前發展。要想系統地了解歷史學的歷史，就不僅要了解這些學派和流派的情況，分析它們的意識形態和歷史背景以及其整個的相互關係，同時還必須弄清其中各個歷史學家的獨特性。這些工作構成史學史的一個側面，在這裡，把握史學思想、歷史觀、以及歷史觀念的發展規律，就成了中心問題。我認為，把這個側面和前面所說的學說史、研究史的側面統一起來，並包括歷史敘述史在內，然後史學史才能作為歷史學的一個部分而宣告成立。但是，這僅僅是一個估計，實際上，在目前的历史學中，不論這方面的準備或學術積累，都是遠遠不夠的。只可以這樣說，許多人已經感到，無論對概括了研究成果而寫成的本講座的讀者來說，或者對撰寫這部講座的研究者本身來說，編寫史學史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本卷就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而編寫的，但是，實際上，也只是闡述了日本史學思想史的一方面。就我們來說，關於近代史學部分，本來打算把歷史學方面的各個主要流派和傾向一一加以介紹，但是，在這樣一個小冊子中，也未能做到這一步。我們只能請有關史學專家就被認為在戰後也還起着重要作用的若干流派和傾向作了一些分析。至於全面地、系統地敘述近代史學和整個史學史的工作，只有留待將來，而本書只不過是為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個準備或嘗試而已，尚希讀者見諒。在編寫近代史學史的時候，當然需要涉及西方史學和東方史學的發展問題，但在本書中，這些也和分門別類的歷史一樣，都未能涉及到。

II

從內容看來，本書大致可以分為下述兩大部分，即：第五篇《啟蒙史學》以下近代史學部分；第五篇以前的構成史學史的所謂前史

部分。作为近代史学开端的以福澤諭吉^①和田口卯吉^②为代表的启蒙史学，在研究史方面一直受到过低的評價，因为它在研究上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但是，从史学史方面看来，正如家永氏的論文所闡明，則不能不认为，启蒙史学是形成日本近代史学基础的一个流派。在明治初年变革时代形成的这一史学，主張只有和政府或統治者的历史相对的被統治者的或文明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之根本，并且为了克服过去的封建史学思想，对它展开了斗争。人們从这个时期才开始明确：为了使日本近代历史学成为科学，从明治时期以来，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必須坚持和封建主义作斗争，而这一斗争，可以說是在这个时期表面化了。在这里，应该特別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把認識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条理”“准则”或“定律”，換句話說，也就是把历史发展的規律，当作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并且认为只有采用所謂“文明史”的形式，才能認識这种規律。不管他們对規律的理解是多么朴素和机械，因为他們把这个問題作为历史認識的根本，这就使得启蒙史学成了近代史学思想的基础。可以认为，区别此后近代史学各流派特点的重要标志是：是否承认历史的規律性和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理解这个規律。如果只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說，近代史学是圍繞着启蒙史学所提出的任务而发展起来的。

正如門脇氏在《官学学院派的成立》一文中所指出，即使似乎以回避这种历史規律問題，并且以专门“埋头研究”个别史料或史

① 福澤諭吉(1834—1901年)，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曾周游欧美各国，创办私塾，教授西学，努力傳播新思想，倡导民权，促进“文明开化”，但后来趋于保守，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譯者

② 田口卯吉(1855—1905年)，經濟学家、文明史学家、法学博士。1879年曾创办《东京經濟杂志》，鼓吹民权和自由主义經濟。著有《日本开化小史》和《中国开化小史》。——譯者

实为特征的明治时代以来的学院派史学，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起初，“史論和时論性的文章”写得过多，后来由于继承兰克^①衣鉢的利斯^②的建議等而有了改变。德国派历史学成为近代学院派的主流，是和明治专制政府采用普魯士式制度一事有关，也并不是偶然的。正象兰克把法国启蒙思想把握規律叫作“理論的独裁”而加以攻击那样，在日本学院派史学和启蒙史学之間，也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情况，日本学院派史学之所以多少带有历史主义的傾向，恐怕也和上述情况有关。学院派拒絕承认历史学中的規律，和这个学派在实际上不可能和封建主义、天皇制度作原則性斗争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关于在史学史中設立官学院派这样一个流派是否正确的问题，我认为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的内部包括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学派，并分为很多不同的阶段。因此，要想用一句話来表述它的特征，也是困难的。因为，不論是继承中国清朝考据学傳統的时期也好，或者是采取了近代的史料批判的时期也好，只要想成为一門學問，它就不能不和封建的儒教的大义名分論相对立，也不能不和国粹主义思想意識相冲突。关于这些問題，門脇氏的論文中也作了闡述。明治以来的学院派就在这种对立的情况下，給我們留下了至今仍然有价值的学术遗产，因此，必須結合这种研究史上的成就来对它进行评价。

学院派史学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把历史学分为很多部門的历史学这件事上。这是从明治三十年代开始的。例如，作为一个部門的历史学至今在日本历史学中仍占有最重要地位的社会經濟史学的成立，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社会經濟史学的成立和特

① 兰克(Ranke, Leopold von, 1795—1886年)，德国近代历史学家，著有《强国論》、《政治問答》、《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等书。——譯者

② 利斯(Riess, Ludwig, 1861—1928年)，德国的历史学家，1886年起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任教。——譯者

征，津田氏的《社会經濟史学的成立》一文作了叙述。在这篇文章里，代表初期社会經濟史学的內田銀藏的精心的著作，被评价为“用欧洲的史学方法給日本經濟史建立体系的最初成就”，社会經濟史学的成立，也确是愈分愈专、愈分愈細的欧洲历史学的研究成果的輸入。不但社会經濟史学是如此，就連以近代法学理論为基础的中田薰博士的法制史也莫不如此。由于历史学这样按照部門越分越細，因而显著地趋于精密，可是，不应忽略，这种情况又給認識整个历史和历史規律带来了一种危机。例如，法制史、道德史、文学史以及思想史等，虽然各有各的特性，而只有把这些个别部門的历史放在整个历史的发展中，才能認識它們的規律，从而作为历史来加以把握。因此，个别部門的历史越是趋向分化和独立，則認識历史的整体和規律也就越发困难。所謂文化史学，恐怕可以算是解决这种危机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方法。

正如奈良本氏的《文化史学》一文中所說的：西田直二郎的所謂文化史学，和专史不同，是想从整体上来理解历史，这也表现在不拘泥于个别事实，而想把握时代的整个精神和規律的态度上。但是，應該注意到，这种文化史学的所謂“时代的精神和規律”，从它成立的初期就表现了十分唯心主义的观点，因而这种“时代的精神和規律”从一开始就和启蒙史学的文明史所了解的历史規律，性质不同。就象家永氏的論文所指出的：根据田口卯吉的历史观，认为文明史归根結底是以受經濟所决定的社会进步为基础；而文化史則不然，正如松本彦次郎的文化史論所集中表现的，文化史主要就是为批判这种文明史而出現的。文化史学存在的意义在于：反对偏重“物质文明”和科学主义的文明史，而把精神文化和文化价值作为历史認識的中心。換句話說，文化史学是企图把細分了的各个部門的历史統一在“文化”这一范疇之中，但由于回避历史

发展的物质和經濟条件問題，而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精神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必然在对历史的統一和整体認識上露出破綻。同时，它对一般的、規律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一貫偏爱个别的和一次性的东西，这是不用說的。况且，明治以来的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已經有了积累，以至不可能简单地用这种文化史学的理論来加以“統一”。要想使这些研究成果在对于历史的統一的或整体的認識中發揮作用，可以說已經要求有一种新的理論，以便更深入地把握启蒙史学所提出的規律性的問題。可以說，这就在史学史中产生历史唯物論的一种必然性。

在进入历史唯物論問題以前，介紹一下上田氏的《津田史学的本质及其遺留的課》一文。津田史学，可以說集中地表現了启蒙史学、学院派史学、历史主义和文化史学所具有的性质和矛盾。象津田史学这样，并不是單純輸入欧洲的历史理論，而是在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的头脑中这样典型地反映出近代史学的本质和矛盾的例子，实在太少了。在本书中所以把津田史学列为独立的一篇，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希望讀者閱讀这篇論文时，不要把它看做仅仅是津田博士个人的問題，而把它看做是史学史的問題。因为在这里广泛地提到了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各种理論問題。单就規律這個問題來說，很少有哪位历史学家象他这样，一方面把研究历史的必然的条理即規律当做历史学家的任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想把規律和概念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为了把握这种矛盾的性格，就必须分析津田氏的必然性或条理的概念，考虑这种必然性和条理的概念賴以成立的基础，同时也不應該忘記，所謂津田史学是作为精神史而成立的这样一件事实。当然，依靠津田史学的所謂“生活”的概念，是无法把握复杂而矛盾的历史結構的。要想对此取得正确的認識，就必须以对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認識为前提。另外，由于津田

史学不把历史上一般的、規律的东西和特殊的、具体的东西看做矛盾,而只是看作互不相干,所以,即使是在理論上它也不可能解决历史的規律性問題。历史唯物論,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是作为无产阶级历史学的基本理論而出現的;但是由于它具有解决以往史学史遗留下来的問題的重要使命,所以它又是日本史学史的必然产物。

为了把握整个历史进程,为了掌握認識历史規律的方法,历史唯物論曾經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呢?关于这些問題,远山氏的《历史唯物主义史学的成立》一文結合关于明治維新的研究史作了詳細的叙述。从这里我們了解到的問題之一是,历史唯物論也是为了具体地把握现实历史,而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克服对历史規律問題的公式主义、图式主义的理解这个事实。同时,它也使我們了解到,采取回避或否认近代历史学所提出的历史規律問題,或故意舍弃某一历史側面問題的办法,都是不能解决这种困难問題的;只有謀求解决規律性事物与特殊性事物之間和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間的矛盾的学术性努力之中,才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新的进步,而規律的内容也能充实起来。对于統一把握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这类十分困难但内容丰富的問題,也得以加深了認識。类型的理論,也是謀求把握历史規律的一种努力,关于这个問題,远山氏作了如下的闡述:“……但同时,陷于类型即范疇論的僵化的情况,也达到极点。为什么历史理論越完备,反而越发降低了历史内容的具体丰富性呢?这就是战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給我們留下的最大課題。虽然已經由野呂作出了正确的估計,但仍然有待于具体化的辯证邏輯,至今还未能完成。”可以說,这几句話已經概括了現代历史学的根本課題和史学史之間的联系。这并不仅仅是历史唯物論所面臨的問題,同时也是一切不回避历史規律問題而願为認識历史不辞辛苦的研究者所面臨的問題。这是启蒙史学成立的同时就提出的

整个近代史学始終一貫的根本問題，根据历史观唯心論的各种史观和历史唯物論究竟怎样解决这一根本問題的角度来着手整理史学史，恐怕是当前的必要任务之一。同时，这个問題不仅是史学研究者問題，而且也是生活于現时代的全体人民的切身問題，也是必須在以政治实践为首的国民运动中逐步提高的認識問題。我认为，将来編写战后史学史的时候，也应该解决这个問題。

当然，历史唯物論是和在它以前出現于史学史上的各种史观根本不同。这是因为，以前的各种史观，尽管形态上是丰富多彩的，然而，毕竟是历史唯心論的不同表现，而历史唯物論則是同这一切根本对立的史观。但是，这个区别，并不否定历史唯物論和以前的历史学傳統之間的联系。家永氏所以強調从启蒙史学开始，經過山路爱山^①的民間史学，直到历史唯物論之間的联系，就充分說明了这一点。除了这一基本綫索以外，历史唯物論究竟和以往的近代史学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問題，也是史学史今后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III

历来认为，日本启蒙史学，即使不是單純的輸入或模仿，但如果离开基佐^②或巴克尔^③等人的史观，也是不可能設想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同时，官学学院派的历史学固然不消說，就是启蒙史学也和江户时代的历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田口卯吉对《日

① 山路爱山(1864—1917年)，明治时代的史論家，所著《源賴朝》、《足利尊氏》等书非常有名。——譯者

② 基佐(Gu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年)，法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书。——譯者

③ 巴克尔(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譯者

本外史》做了严厉的批判，是和他对新井白石的《讀史余論》的史論給予很高評價一事有关，因此可以說，早在江戶时代就已經在某种程度上为启蒙史学准备了条件。象福澤諭吉那样同过去的决裂，在以田口卯吉为主流的启蒙史学中表現得并不那么明显。因此，为了理解日本的近代史学，至少也需要明了江戶时代的史学史是其前史。本书包括了渡边氏的《罗山史学》和松島氏的《新井白石》两篇論文，借以考察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側面。正如渡边氏所指出的，为近代史学史奠基的罗山，为了拥护武家政权和肯定现实以及站在为統治者提供政治参考資料的立場上所做的历史研究中，已經显示出若干不同于中世史学的新特色，这是值得注意的。罗山排斥佛教的超越的史观，試图根据具体事实研究历史的客觀态度，大大不同于中世史书所表現的主观的和自我主張的态度。至于我們所要了解的关于罗山的“现实主义”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究竟占有应该怎样的地位，以及罗山的学說中存在的“許多矛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結構等問題，希望今后专家們能从同古学^①和国学^②的史学思想的对比上来加以說明。我們还想了解，現在，罗山在研究史上已經沒有多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白石也一样），而在史学思想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对研究古代的专家來說，直到今天《古事記傳》还是座右必备的最切实有用的参考书，但是，对研究中世的专家來說，以《本朝通鑑》为首的罗山的著作，却已經不起多大作用，这种不同，又是

① 江戶时代兴起的儒学的一个派別，以山鹿素行、伊藤仁斋、荻生徂徠为代表。他們反对宋明的性理学，任意用自己的見解来解釋所謂孔孟圣人之道，而主張直接研究孔孟，并絕對相信，毫不怀疑。——譯者

② 国学是江戶时代中期以后，以賀茂眞淵、本居宣长等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这一派人通过对古典的研究来闡明日本在受到儒佛思想的影响以前的日本固有精神，排斥儒佛，树立了复古思想的理論体系。早期的代表人是契冲和荷田春滿。——譯者